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 and
the Charter of Human Responsibilities

主编 赵轶峰 于硕

Edited by Zhao Yifeng and Yu Shuo

当代文明的 困惑与追求

解读《人类责任宪章》

团结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欧洲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的赞助

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

——解读《人类责任宪章》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 and
the Charter of Human

主编 赵轶峰 于 硕

Edited by Zhao Yifeng and Yu Shuo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解读《人类责任宪章》/
赵轶峰,于硕主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2
ISBN 7-80214-110-9

I. 当... II. ①赵...②于... III. 社会发展 - 研究 -
世界 - 21 世纪 IV. D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048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装订: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本:140×203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45 千字

印数:2000 册

版次:2006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14-110-9/D·59

定价:28.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序言：文明时代的困惑与追求

赵轶峰●

人们有时把历史比作河流，感叹它的浩荡汹涌，曲折婉转，不止不息。然而河流有它从源头到终点的床道，虽然偶尔泛滥横行，却在大多数时候重复着自己的轨迹。人类从自己的往日走来，每一天都是前所未有，每一步都踩出新鲜的脚印。人们可以根据对过去的记忆和思索，推测和设想前边的处境与道路，但现成的河道却总是没有的。当人类走到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一个时刻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同类，正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汪洋恣肆，横无际涯的一片秋水，奔腾浩淼而莫问其所之。“全球化”就是这样的时代。

曾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久不息的意识形态、种族对抗的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刚刚开始为平静的迹象庆幸，新的战争、新一轮人类生存资源争夺、新的不安全感就和一大堆表示冲突与威胁的新词汇一起进入我们的生活了。这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乐观地推断，21 世纪将是一个发展的世纪，但是我们无法同样乐观而负责任地推断 21 世纪也将是一个和平、和谐、合理的时代。这个世界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糟。对一些人来说会变得更好，对另一些人来说会变得更糟。当前景中包含不确定性的时候，人类最少需要有一部分成员保持对可能带来糟糕结果的人类行为、制度、状况的特殊警觉。《人类责任宪章》就是在

● 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这样的時候產生的。

中文里的“宪章”两个字可能带有较强的强制规范的寓意，在英文和法文中，它都意味着一种言简意赅的约定，它的规范意义是以承认它的人们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人类责任宪章》就是一份倡导全人类和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对他们的行为、处境和命运一起担负起责任来的约定的草案。提出这样一个草案的一个认识前提是：人类的进步和这种进步所遭遇到的新的挑战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如果不能在彻底反思现存人类社会的基本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得到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的伦理价值体系，人类就会无可挽回地毁坏自己生存的条件。这种内在的自觉不能等待任何权威的赐予，必须要由普通的人们自己来探求，因为它的意义就在于克服普通的人类成员在种种人造的支配体系中的无能为力、冷漠和盲目性。这样的文本不能不由少数人起草，但在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之前，它并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于是它不能不体现为一个运动，体现为当代世界公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传播、研讨和修正使它日益成为当代这个紧密联系起来的世界中生活着的人们自己的诉求。

这项努力是在 1995 年由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发起的。● 经过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各界人士的多次讨论，在 1999 年形成了“人类责任宪章”的第一个文本。1999 和 2000 年，这个文本被呈交到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各专门领域、各社会文化的代表人士参加的无数次会议上加以研讨。在不计其数的反馈意见乃至全新方案的基础上，2001 年，形成了大致能够包容各种建议的新的文本。2001 年秋，来自世界多个主要文化体系背景并长于语言、文字、措辞的一个审议小组在希腊

● 10 年来，欧洲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不懈地为支持《人类责任宪章》工作在财政方面的需求提供支持。查理·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是根据已故瑞士科学家、实业家查理·梅耶先生的遗嘱，基于他捐献给公众事业的遗产组建起来的。作为一个资金来源单一的基金会，这个机构多年来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利益或者权力机构支配，按照自己的宗旨服务于以促进全球人类相互理解为中心的进步事业。

塞洛岛对新的文本从文化、语言差异的角度进行了推敲和修改。2001年12月，修改后的文本被提交给在法国里尔召开的“世界公民大会”，与会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再次审查了这个宪章的多种语言文本，原则通过，并在宪章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在那之后，宪章开始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并被提交给了联合国。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人们，继续着对这个文本在自己文化中的具体含义的推敲，每个文化体系中关心这件事情的人都希望知道，这样一个文件对于自己具体地从属的人群和传统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过程可能要继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应该是对它的进一步修改。也可能，若干年以后，人们发觉这个“宪章”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变化了，因而它不再是需要特别关注和求得明确结论的事情。或者，人们发觉了更好的能够包容这个“宪章”思想的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宪章”的倡导、讨论和传播所曾经发生的作用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人们把这部宪章当作历史而不再是现实的对策的时候，仍然会想到，它曾经提出了关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认识，也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案，成了人类最终做出明智选择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我是在1998年到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克林根塔尔（Klingenthal），参加一个关于各文明、文化、传统关于土地的观念的研讨会时，开始接触到后来成为这个宪章思想来源的一些思想者的。当时我只是被邀请去谈谈中国的儒家关于土地的传统观念。●那时我最强烈的感受是这些人中有一种在当代中国的一般人群，甚至学者中，久违了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全球性的人文关注。在那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依次把家乡的一抔土壤放

● 我提交该会议的论文发表在 Rabah Lahmar 和 Jean Pierre Ribaut 主编的 *sols et sociétés, regards pluriculturels* (Paris: E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 2001)。后以“土德：儒家土地观念的现代诠释”为题，收入《学史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

到一个高高的玻璃圆筒中，于是世界土壤质地与颜色的差异就与作为人类生息源泉的“土地”一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与会的人们，即使是对于中国了解不多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都很恳切地希望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土地，了解中国价值和中國哲学中的人—自然关系，因为他们相信，中国的传统中，应该包含有值得今天的人们重新思索和借鉴的东西。我说到朱熹并不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担心人类的活动会在根本上破坏自然，因为人的渺小，只能破坏人自己在自然中的生存条件，归根结底只能破坏自己。● 他们的回应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振奋。

1999年，我再次应邀，到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关于各文化、宗教、哲学的价值体系比较的会议上谈谈儒家的思想，并对正在讨论中的《人类责任宪章》最初的草稿提出一些意见。当时的初稿，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才更多地关注普遍伦理的建构。在那次会议期间，我对“宪章”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皮埃尔·卡蓝默先生做了一次访谈，力图理解他的思想的大纹理。我觉得他的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还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与我们比较熟悉的许多思想家不同的是，皮埃尔·卡蓝默的反思不是学究式的和纯粹思辨的，是实践的，是基于他本人长期在欧洲国家管理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验的。这种理路与我这样以历史学为生涯的人的思想习惯很有相通之处。而且，这接近了承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称为思想家的普通的人们的生活，正是思想，尤其是伦理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源泉，从而正视思想的权利属于每一个实践中的人。此外，皮埃尔·卡蓝默的思想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他的反思是整体性地对构成所谓“现代”社会基础的西方哲学、伦理学、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际体系的综合反省；二是他对于世界文化的价值多元性具有强烈的认同。前者意味着走向超越“现代”社会理念的一种可能性，这

● 朱熹的学生曾问他：“天地会坏否？”他回答说：“不会坏。只是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见《朱子全书》。

对于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许多思想者并没有充分注意“现代性”所受到的来自实践的质疑，很少保留地倡导着启蒙时代到20世纪中期形成的工业化现代社会观念，而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困难也正是那种观念在促成了种种发展的同时带来的后果。后者则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方案——很可能是人类避免在对“发展”的追求中成为精神、文化完全齐一的同构体，从而使精神创造的基因退化的不可避免的思想道路。这本文集多处讨论了皮埃尔·卡蓝默的近著《破碎的民主》。读者在注意他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的同时，不妨揣摩一下上面所说思想的痕迹。

后来的几年中，我参加了关于“宪章”修改的多次会议，包括2001年塞洛斯岛审议小组的工作和同年年底的世界公民大会。在介入具体的文本修订过程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这个“宪章”的基本思想，而是这个思想体系在世界范围各个文化、社会、语言体系中可能的共同合理性基础。这个“宪章”最初是用欧洲语言起草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欧洲语言、文化特殊的色彩，这在多文化视角的审视下，显现出许多价值取向冲突、语义模糊、无法对译等问题。许多民族语言中没有相当于“责任”的词汇，需要借助已有的语言要素将它“创造”出来；在一些文化中，“责任”不如“自由”，或者“尊严”，或者“平等”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人们更关注生存或者发展，“责任”远不是他们心中的当务之急；还有许多人提出“责任”的种种更具体但彼此不同的体现，如“爱”、“宽容”、“和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语言的“宪章”实际都已经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一些“让步”。这样形成的实际是多个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类责任宪章》的思想内核，同时不与各文化的基本价值冲突的文本。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可能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在更紧密地走到一起时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模式缩影。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文文本，基本上仍然是欧洲语言本的对译本，并没有做特别

的改动。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责”的概念，也早就有以“天下”为个体责任的伦理，并且从来注重人一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个产生于20世纪末的宪章参照于西方现代观念主要是一种关于最近传统的反思，而参照于中国最近的思潮，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对更早传统中某些精神与智慧的重新诠释甚至回归。

当然，正如读过这个文本的人大多感觉到的那样，它的表述方式是跳跃性的，对于对它背后的思想没有足够了解的人说来，很多地方有些模糊，也有很多地方很平淡，还有一些说法会引起进一步的疑问。另外，更多的人习惯于接受或者批评各种意义上的权力主体提出来的文件，质疑这种由普通人提出来的文件的权威性和实际意义。其实，这个文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要求”人们直接接受的文件。它的意义和制定与修改的方式都在于提出问题和引起参与。所以根本不必从是否整体地接受它的意义上来评价它。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可能自己达到的认识是更重要的。而且，这个“宪章”是探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文件，伦理价值本来不是需要权威来给予的。这本文集收入的就是世界各地关于《人类责任宪章》思想讨论的大量文献中的一小部分。它们应该有助于实现对“宪章”思想的具体解读，从而引起更多的普通人对人类共同事务进行积极的思考。作为编者和读者，我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想到最多的问题是：人类主流社会现在的观念和制度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是不合时宜的？

这里所说的“主流社会”观念和体制，是指在16世纪以来的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和体制。众所周知，这种观念和体制是起源于欧洲的，后来以加速度和逐渐变异的方式普及于全球。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价值观等等，都是它的主要特征。这个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曾经带来人类的巨大进步，也伴随着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当这个框架的外部挑战淡化下来的时候，框架内部的竞争却大大增强了。即使这样，到20世纪末，

当“全球化”成为谈论全人类事务时最常使用的词汇的时候，人们还是似乎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需要质疑这种框架的合理性问题了——需要的是如何在这个体系中分得自己的份额；而份额的划分根据，依照这个框架自己创造出来并日益被看作理所当然的逻辑，仍然是实力。不过，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的实力竞争与以往时代的相比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正像“地球村”这个概念所谕示的那样，人类生活的舞台相对于人的能力已经极大地缩小，人操纵这个舞台的能力达到了足够摧毁这个舞台的程度。这就如同一个人原来是在旷野中纵情地拳打脚踢，现在却是在一个玻璃房子里边做同样的事情。人类的科学技术、武器、工业污染和能源消耗、“看不见的手”操纵的市场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加上因为人的关联性密切程度的增强导致的传染病传播的新规模与新速度，使得人类如果纵情地竞争，迟早会伤害到自己。人类必须找到一种和谐地——包括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和发展的道路，而在伴随“现代”社会逐渐确立起来的“主流”观念中，和谐并不是一个基本原则。所以，现有的观念是应该加以整理的。

这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是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种反思的。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的“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在讨论了“全球化”的历史和复杂性之后提出，一个全球性的“世界文明”正在不可避免地形成中，而人类并没有把握这样的文明的思想体系和组织架构。他还反省了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主导了人类思想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其成功的模式便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这一表面看来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构建的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神话。”“发展”本身带着所有西方文明中可疑的、有害的、消极的因素，虽然也包含着少量的积极概念：如人权，个体责任，人道主义精神，民主等……它给人们带来了

科学的、技术的、医学的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对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结果是新的奴役取代了老式的奴役。而且，“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理想和目的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文明自身正在危机当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集中于城市的技术与工业的兴旺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在西方式的发展逻辑支配下形成的全球化世界，可能会走向某种全球帝国体制，在那种体制中，“人”仍然会处于强大的——虽然可能是更隐蔽的——控制权力支配之下。对于莫兰说来，当前“最可怕的威胁和最宏大的许诺同时来到这个世纪。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在许多领域获得解放，包括突破一些不可想象的物质的、机器的、官僚体制运作中的限制，以及疾病与死亡的生物限制；另一方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环境恶化制造的集体死亡给人类投下阴影。未来展示给我们的既是黄金时代，也是恶魔时代。也许它们在继往开来的路上会一直并肩走下去，从某个新的社会学水平看，这只是全球的铁器时代和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也许，真的如莫兰所说的那样，人类还没有资格过分地自信，还应该保持谦卑和谨慎。

皮埃尔·卡蓝默的“破碎的民主”一文是从他的同名著作中节选出来的。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今天，在世界的范围内，“民主高奏凯歌，但这是破碎的民主。”他对当代民族国家的嬗变和局限做了批判性的反省。当代国家由于把一些公共职能重新分配给更小的机构、私有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或者呈交到更大的同盟机构和参加国际公约，已经不能成为把握公共生活的完全可靠的基础。通过控制财富而实际上掌握着对于人类命运巨大支配权力的大跨国公司的行为实际脱离了公众的监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必须重新探索公共权力的基础和新的公共生活“治理”的机制问题。“我们的机构体制完全像最后阶段的托勒密体系。在地方和地区，我们堆积了各种机构，以及相互竞争、相互抵消的中间机构。在国家一级，我们每年都要增设新的横向

机构，但又无法改变行政机构的分块运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断增加目标和负责达到这些目标的机构，但没有一个机构真正拥有必要的手段，也没有标准和规则的层次。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改变视角，改变观点，对体制进行重新组合。”他所提出的治理革命的方案未必对于每个社会中的人们都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但是他关于对人类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必须彻底反省并谋求改革的思想，却的确是“哥白尼式”的。

在皮埃尔·卡蓝默的思想中，治理革命并不是纯技术性的，它需要有一种新的共同伦理作为自觉行为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张的继续。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制定、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为我们必须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种灵魂、一种意义、一些规则、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

这是与治理革命同样复杂，或者更为复杂的事情。人们要问：我们现在的伦理究竟出了哪些问题呢？世界性的共同伦理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它与承认文化和价值的多元性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现成、完整的答案，不过，尝试性的许多探索还是提供了一些思路。比如“破碎的民主”这样的命题就意味着，“民主”在20世纪后期的社会实践中，作为抽象的价值，得到了空前普遍的认同，作为人类组织体系的实践方式，却已经扭曲、工具化、支离破碎了。因而人们普遍地认同了一个无法完美实践的价值。况且，民主从来只是在民族国家内部来实践的，迄今为止的国际事务从来没有按照与民族国家内部的同样的民主法则来运行——实际的法则在观念的层面是“公正”，在实践的层面是“实力”。人们也并不知道，民主应该、能够、可能成为“一体化”世界运作的根本原则吗？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一个具体的实践体系。其他如“自由”，曾经是不证自明的价值准则，但是自由从来是以“权

利”和“权力”为条件并与后者成正比的。各种意义上的支配力——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力、财富、名誉、战争手段、知识等都可以扩大自己的自由，限制他者的自由。比如，在“自由”贸易中受益最大的，从来都是拥有支配力的人群。世界性的共同伦理应该是可能的，但它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新的霸权，也不能囊括人类的各种行为。它应该是一种高度概括性的，只限于人类针对共同生存的最根本性问题而达成的关于人类行为规范的自觉共识。

关于共同价值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可以参看荷兰的伊迪丝·悉佐博士专门为本书撰写的“文化与责任”一文。她认为：文化是“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所做回应的复杂的整体”。人们对挑战做出回应的方式来自传统、借鉴和创造。因为挑战总是处于变化中，文化也就成为一种有活力的过程。人们被他们的文化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文化。文化提供给人们归属感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与条件，它帮助人们在必须做选择时做出抉择，并确定组织起来的个人应对冲突的战略。“各个文化/宗教关于自我、他人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还有人类和他们周围的生命世界的关系的观念是不同的。注重这种差异可能会更深刻地达到对世界各地人类群体责任观念的基本理解。”这就是说，只能在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思考人类在共同的领域能够达成怎样的伦理共识。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伊迪丝·悉佐在过去的许多年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奔波于世界各地，从事关于语言差异与文化沟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种工作，显然是探求人类共同伦理的一个基础。

尊重文化多样性逻辑上与尊重公民社会和普通大众是一致的。从前的社会理念是通过“精英”的启蒙和事实的胁迫而普及起来的，那是在普通民众大多文盲的时代发生的过程。21世纪，人们可能不需要重复同样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人类责任宪章》的讨论一直注重普通的人们，在关于“宪章”的讨论会上，中国和非洲的农民和欧洲的哲学家有同样的发言权。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关注一下新西兰的蓓塔森·马丁博士应邀为本书撰写的“责任：生命的守护者”一文。她的文章在特别关注现代社会的弱势群体——土著人和女性的前提下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责任问题。她不赞成通过“平等”来实现弱势群体的合理地位，因为“平等是一种错误的景象，因为它是一种被大众所同化的形式。”“如果女性和男性的‘差异’得到支持，而不是把女性纳入到男性的价值观中，便有可能为新生生命观念的产生和传播奠定基础。”从对于女性和与自然更为和谐的土著人的传统智慧的关注出发，蓓塔森·马丁倾向于一种以有生命的地球为中心的人—自然生态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欣赏以及尊重不同的知识而得以改进。”“单一文化的思想与旧式的科学压制了多样性——知识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多样性通过对差异的尊重才能得到维持和成长。对我们直接经验之外的思想和行为的热情一定会让我们了解各种社会的组织形式。”“把一种分开、隔离和过度开发的世界转变成一种体现现存生命体系原则的世界观就相当于把文化从单一性推向生态性和多样性。”毋庸讳言，蓓塔森·马丁的文章中显露出西方女权主义特有的一些倾向。不过我们知道，现代西方女权主义本身就是对工业社会“现代性”的一种逆反和质疑，它是批判性的，因而有时是激烈的。在殖民化过程中被消灭或者边缘化、客体化的西方国家内的“土著人”是祭献在现代社会面前的最大的牺牲。他们至今被主流社会乃至大多数人看作是欠“发展”和欠“文明”的。相信进化论的历史学家们——我自己的职业上的一些同侪——认为为了“进步”，土著人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略表遗憾之后就转而去赞叹那场进化带来的奇观了。然而我们丝毫不比那些土著人更有资格被称为人类。

本书中的其他文章，也各自探讨了一些与《人类责任宪章》的思想有关的问题。第一组主要反映的是与“宪章”思想背景大体一致的有关当前世界问题的一些讨论。第二组主要是关于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的“法国思想家新论”丛书的评论与介绍，

可以被看作是解读《人类责任宪章》思想的参考文献，它们与“宪章”思想关联的程度各自不同，但都具有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取向。其中，黄万盛先生为《破碎的民主》所作的序言“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对把握该书的要旨有更直接的意义。感谢这些文章的作者和三联书店同意我们将这些文章收入这本文集。第三组是关于2001年世界公民大会的几篇短文都是作者们在该大会之后不久写作的。它们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宪章”的背景和当代世界公民运动的一些侧面。另外的文章，则主要是在对“宪章”的研讨会议中形成的思考。所有这些文献集结在这里，都为着同一个目的，这就是表达人们对当代全球性问题所做的一些思考。

2005年7月27日

序言二：走进“人类共同体” 的生态时代

于 硕

这本关于人类责任思考的文集是十年来国际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见证。这一实践由最初的低音徊转，变成了今天大家都感兴趣的课题。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也由少数几位欧洲的智者扩展到全球各个地区的各类人群，有最著名的思想家如莫兰(E. Morin)，有睿智的国家首脑如罗卡尔(M. Rocard)、戈尔巴乔夫，有思想家与行动者兼备的领袖人物如卡蓝默(P. Calame)，有诗人、艺术家，有企业家，也有普通的青年大学生、工人和农民。参加2001年里尔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有50位中国代表，其中有著名思想家秦晖，也有河南农民崔国顺。文集产生于全球的男女公民们无数次的聚会、研讨、田野实践。所以本书不是单给学者看的，而是给所有人的。学者需要有人文关怀才能沉静下来，体味其中深厚的哲理和伟大的激情；普通人需要有公民意识才能进入角色，承担自己义不容辞的“匹夫”之责，并从中体会世界公民的使命感。

它的独到之处体现在产生的时代、面临的问题和期待的精神境界。

我们正在进入“人类共同体”的生态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关乎人类整体存亡的自然问题，我们需要提升的是超越国家主权、超越种族的人类责任精神。

比起过去的时代，如果说神圣时代的古人们服膺于信仰，英

雄时代以来的人们受制于理性，今天的我们既不能单纯地信仰也不能极端地理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第三问题，即自然生态问题。自然是我们的本原，生态是我们的家园，既是神秘的又是可切近的。近代以来人类以工具理性征服自然，却最终使我们的地球家园创伤累累，直到它开始对人类愤怒地反抗，近年来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即是证明。

人类需要在大千宇宙面前反省自己“人定胜天”的谵妄，唤醒心底的神圣性。发展主义的疯狂导致社会失衡，道德底线崩盘，自然资源枯竭，到了踩刹车的时候了。为了人类的可持续，踌躇满志的经济人将让位给敬畏生命的生态人。也正是在这一自然生态的大框架下，不同国属、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类才可能获得“我们”的认同意识，并一起思考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各自文化的、历史的多元经验为人类共同体的治理提供独特的共享资源。

这是本文集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和期待。

2005 年初秋巴黎